

# 政治思想史「作為」什麼？

## ——一項生態觀點的序言

陳 瑞 崇\*

政治理論與政治學者在政治學社群之建立、維繫、變遷及重建等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本文分為三部分：(一)政治理論與政治學社群：以《新政治思想史》為例，提出「生態」觀點：學術論述是學術社群成員的交往方式與媒介，即是成員之社群關係展現，以釐清理論與社群之互為建構的關係。(二)政治學社群與政治社群：從政治學社群的辨識，誰論出政治理論之生態意涵的第二項脈絡，兩者仍存在著互為建構的關係。(三)生態觀點之應用：以「政治思想史」作為評估與重建政治學社群之基本策略。本文的寫作期望能為學術社群成員之常態論述行為建立起碼的自省基礎，使得學科進步的可能性不致葬送在社群成員的狹隘心態 (parochialism)。

一個人能獲知什麼，不僅決定於他從探溝裡挖出了什麼東西，也決定於他問了什麼問題。

—村靈·鳥 《自傳》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起，一群英國政治思想史家，針對當時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發動猛烈的批判與反省，所展現及試圖扭轉是對於所執行行業之曖昧性質及範圍的不滿。他們藉著重建自主的方

---

\*本文作者係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講師。

法論基礎消解該領域的混亂<sup>(註一)</sup>，以「政治思想史『是』什麼」作為重建此研究領域的策略。這項重建牽涉到二個部分：從研究對象、方法、目的、與其他領域之區辨等問題的重新回答，看待過去及評估現狀，即從方法論的正當性推論出知識上的可能。如果 John Gunnell (1982)所稱的「新政治思想史」(New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以下簡稱《新思想史》)，成功地說服其他成員「改宗」，那麼我們可將這場六〇年代初期展開的論爭，稱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革命」。

主張《新思想史》的學者，雖然在若干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sup>(註二)</sup>，但作為一股持續的反省與建設力量，仍具有四項可彼此呼應的基本論點<sup>(註三)</sup>：a、研究性質：政治思想史是歷史研究而非哲學研究。b、研究對象：人類在歷史中發生於多元層次及具有多重意涵的論述或思考活動而非局限於高度抽象的哲學體系。c、研究目的：還原求真而非論善惡或求是非。d、研究方法：歷史詮釋而

---

註 一：「他們基本上接納十九世紀德國史家蘭克 (Leopoldo Ranke) 之『科學的歷史』(Scientific history) 之觀點，即是治史者應力求呈現歷史之原貌，並且避免以現今的精神投射於古代事物之上；……史家之任是重建 (re-construct) 與重覆 (re-experience) 歷史；為求於此，研究科學般求真之精神及講求方法之態度乃為必須。他們一致同意，從事歷史研究首重講求方法，好歷史須要好方法。…對這些英國政治思想史家而言，當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建立起政治思想史這一學科在研究範圍及方法的特性，亦即是所謂 disciplinary autonomy。」(陳思賢，1989: 5-7)

註 二：例如 J. G. A. Pocock 與 Quentin Skinner 對作者意圖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s) 在歷史文獻之詮釋中的重要性，即有重大歧見。可對照 Pocock 1985: 3-7, 1989; 23-25, Skinner 1978, 1988a: 63-67, 1988b。Umberto Eco (1992a, b, c) 則認為作者或詮釋者意圖難測，且常與文獻的詮釋無關，轉而主張文獻意圖 (the intention of the text)，因為文獻所引發的共鳴作用會塑造標準讀者 (model readers) 及標準作者 (model authors)，導致他們進行正確的閱讀，然後產生正確的詮釋，在這項過程中，原作者與讀者的角色都消溶於於文獻所引發的詮釋格局中，舞台唯一的主角就是文獻，這項說法的關鍵在於他對語言 (language) 的討論。這種刻意建立閱讀方法與目的的討論自然受到實用主義者 (pragmatist) 的強烈抨擊，請參見 Richard Rorty (1992)。

註 三：Quentin Skinner 曾明白承認，對自己的詮釋理論有著深遠影響的學者有 R. G. Collingwood 的歷史理論，Alasdair MacIntyre 的行動哲學 (philosophy of action) 及道德概念史的研究，Martin Hollis, J. O. A. Pocock 及 John Dunn 等人的方法論作品 (1979: x, ft 2)。

非哲學、文獻 (textual)<sup>(註四)</sup>或脈絡( contextual)分析。這四項論點所指涉的是執行一項研究活動的「正當的」特定作法。因此，我們可斷定：六〇年代這場關於「思想」的論述是源於針對政治學社群內既存特定之論述規則與行為的質疑，以重建論述規則及論述目的為目標。如何理解這場「政治思想史『是』什麼」的討論的生態意涵<sup>(註五)</sup>？

## I、生態觀點

托勒密的宇宙體系，亂像是一個藝術家要畫一張畫，從不同的模特兒臨摹了手、腳、頭和其他部分，然後不成比例地湊合在一起，儘管每部分都畫得極好，結果各部分不協調，畫出來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個怪物。

—哥白尼《天體運行論》

---

註 四： Skinner 曾指明 John P. Plamenatz (1963)的 *Man and society* 是文獻途徑的代表(1978: xiii)。Plamenatz 問：對政治或社會思想的研究是否必須掌握其產生之歷史、社會、政治及文化背景，才得進行？他並不否認這種作法的好處，但還是主張：只需瞭解思想家如何使用概念，如研究「利維坦」的主旨即在討論霍布斯如何運用「法律」、「權利」、「自由」、「契約」及「義務」等概念，方式就是直接研讀他所呈現的論證。對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研究焦點是理論的相關性 (relevance) 與正確性 (adequacy)，即問理論是否對研究對象提出充足的解瞭？理論的假設與觀念是否有助於解釋？( xiii-x)

註 五：就筆者所知，無論贊成或反對「新思想史」的學者，主要從方法論與詮釋方法的推演關係、語言分析與政治研究的性質與目的的相容、個別學者詮釋方法之應用及其適當性等，討論這場論述在後設理論上的意涵。例如 Richard Ashcraft (1975a, 1980)、Deborah Baumgold (1981)、John Gunnell (1982, 1987)、Michael Levin (1973)、Michael J. Shapiro (1981)、James Tully (1988)、陳思賢 (1988) 等。筆者認為，理論常像是國王的新衣，在驚愕、遲疑與偽善中演出，在不知所措中褪色。如果不去辨明理論與學術社群的關係，這種對理論的學習後果，從最保守的角度來看，使我想起孔恩在《後記——一九六九》的一段話「他仍然可能使用這新理論，但他這麼做的時候就像個在異域中的異鄉人，他到那兒只是因為當地已有本地人居住。他的工作寄生在本地人上面，因為他缺乏這個社群的未來成員透過教育而獲得的心理接收器組合 (constellation of mental sets)。」( 1991: 264) 本文的處理則儘量維持對歷史的尊重，真相比對錯更難以發掘，生態觀點是趨近真相的途徑之一。

典範一攻變，這世界也跟著改變了。…這就好像整個專業社群突然被載運到另一個行星上去，在那裡他們過去所熟悉的物體都在一種不同的光線中顯現，而且它們還與他們不熟悉的新事物結合一起。

學術社群成員的行為特質是透過形式化的論述表示見解，成員之間的關係就在論述本身及其引發的交往過程中產生。這項關係的維繫或變遷的指標即在於彼此對執行之行業的目的、對象、方法及意義能否保持共識，這類共識的展現及認識則必須透過實際教學與研究活動的潛移默化。本文所稱「生態」觀點<sup>(註六)</sup>就是：a、將既存的教學與研究及相關制度與行為，視為學術社群的生態環境。b、將發生於其中的論述活動視為成員之力的關係之構成、展現、變遷或重建，即對既存之社群關係的擁護與反叛。c、從論述與社群生態的關係進行著手理解與解釋這些論述，即將學術論述視為發生於既存社群關係所構織而成之網絡的行為，這項網絡稱之為「傳統」，它能將各類論述安置於（或嵌入）適當位置，藉著特定區位及與其他區位之關係的標示，為論述賦加其獨特意涵。當論述失去或改變原有區位，勢必喪失或重建意涵。簡言之，從生態觀點來看，任何學術論述的內涵、建構及再論述（反應），都會以特定形式與既存的學術社群的形成、變遷及衰退，建立起互為建構的關係。這項觀點的分析要點是：「論述」所指涉的社群結構層次及論述的過程與結果。

從生態觀點來看，《新思想史》對傳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批評及所發展出的方法論，所指涉的是社群成員執行業的行業規則，即試圖以另一組宣稱在方法論上自主的規則安置常規的論述活動，重新賦加發生於特定層次之論述行為以不可共量的(incommensurable)意涵，此舉將挑戰及重建成員們對專業論述活動的信仰與作為，這也勢必牽動社群關係的整體結構。在政治活動的領域中，這類的挑戰與意圖就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因此，這場

---

註 六：本文所提出的生態觀點及其應用，深受以下學者之啟發：Richard Ashcraft, R. G. Collingwood, Thomas Kuhn, Michael Oakeshott, J. G. A. Pocock, Sheldon S. Wolin.

至今方興未艾的論述<sup>(註七)</sup>已構成政治學社群中的一項生態現象，不論其成敗，它所涉及的層面絕對不局限於提供一項詮釋方法，或只是一場關於詮釋西洋政治典籍的爭議<sup>(註八)</sup>。一旦爭議平息成為定論，社群成員必須會將這項定論納入學科教育的一部分，透過必修課程及理論之相關實例，使學生認識政治學社群的現況及歷史，學習不同角色在社群結構中的區位與關係。更重要的是，這項學習必須經由其他成員的示範，即展示政治學作為一種行業的活動才得完成（Kuhn 1991: 95, 191-8）。

因此，當 Pocock 等人不滿「政治思想史」在不同層面所引發的曖昧時，他們所舉發的議題，不是單從知識論及方法論等層面，界定政治思想史「是」什麼可以辨識及解決<sup>(註九)</sup>，因為《新思想史》

---

註 七：這點可以從 Pocock 及 Skinner 的方法論及史學論文所引起的持續爭論看出，最明顯的指標是根據二人所提示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所編出的論文集：Anthony Pagden (1987); Terence Ball and J. G. A. Pocock (1988); 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essel L. Hanson (1989); Gisela Bock, Quentin Skinner and Maurizio Viroli (1990)。由劍橋大學出版的 *Ineas in Context* 系列論文集，其編輯立場可說是 Pocock 及 Skinni 的方法論的顯著效應，「本系列將討論學術傳統及相關新興學科的源起。其間所產生的程序、目標與詞彙將被安置在當代之觀念及制度架構中的各項脈絡加以理解。針對學術傳統之源起及由其他學者發動的修正，透過細緻的研究，希望得出一幅關於觀念在各自具體脈絡中的發展的新圖像。藉著這項方式，哲學史、不同的政治及社會學科及文學之間的人為界線都將打破。」此外，對西方學界而言，一九六二年 J. G. A. Pocock 發表第一篇檢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章時，可能意味著一場重塑西方「政治傳統」的活動的開展。從主要參與者之著作、參與編輯之論文集及主編之叢書與典籍來看，儘管他們針對的是一項詮釋西方政治傳統的行業，但其意圖則是透過專業論述行為的改造，改變西方人對自身傳統的詮釋，因為「政治思想家是政治社群的成員，也在此種脈絡中進行思考。」(Pocock 1989: 17)

註 八：從後設觀點來看「新思想史」的論點，會將焦點放在「方法」層次上，劍橋學派的基本論點「自然離不開詮釋古典之技巧，許多紛爭亦由此而來，於是我們面臨一個新的主題—詮釋學(hermeneutics)，或是 textual theory。」(陳思賢，1989: 7)

註 九：政治思想史「是」什麼反而常是論爭的焦點，因為學者們總以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消弭混亂的唯一途徑。如果我們去回答以下問題，也許可較清楚地表現所謂「生態的」角度；社群成員為什麼總以界定「什麼『是』什麼」的方式，去面對來自社群內外對社群之構成的質疑？此外，就本文主題而言，處理「政治思想史『是』什麼」的問題，必須考慮以下因素：一、無論是按照 Pocock 或 Skinner

與所指的曖昧現象及挑起方法論層次的爭論，源自亦構成活生生的社群生態，它們各別的意涵及關係必須從中才得分辨而不是加以分割，孤立看待。如果我們試圖貼近《新思想史》的生態意涵，唯有以相稱的方式來問：在政治學社群中，「政治思想史『作為』什麼」？<sup>(註十)</sup>

本文主張這項問法的第一項理由是：政治理論與政治學社群的形成與變遷存在著互為建構的關係。學術社群成員的常規論述活動是指向整體生態環境的運作，成員在這些活動中所憑藉的及針對的即是政治理論，也就是透過教授及研究理論的過程，促成生態環境的運作或變遷。當社群生態與理論的建構、傳布或推翻緊密相關時，對理論的信徒、傳播者及對手而言，那些理論何以以及如何具體地構成或改變社群生態就是一項緊要的問題。那麼當

---

的詮釋立場，面對這些發表於六〇年化的文獻時，如果我們不先去探究當時政治學社群的諸論述典範或參與論爭的創創意圖，又如何將這段論爭或個別學者之主張加以還原？如果孤立創作的歷史脈絡的作法是可以容許的，他們又如何能期望去說服其他社群成員？因此，Pocock 及 Skinner 的方法論文獻固然可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這些文獻更提示了其他成員處理前人作品的原則，當然包括 Pocock 與 Skinner 自己。二、所謂「劍橋學派」成員除了有著共同箭靶外，彼此的方法論仍有明顯的差異，如何在「學派」或「運動」或「革命」的背景之前，展現彼此的異同，是一項必須考究的問題。筆者以為初步的可行作法是：在共同議題的範圍內，分辨個別理論的差別。這些議題是針對政治思想史的學科自主性進行方法論上的重建與釐清，包括研究目的、對象、方法及政治思想史與其他領域在前述問題的差別。

註 十：本文一再申論，任何學術工作者透過研究、教學或其他活動，所明示或默示的都是「什麼『是』什麼」的方法論立場，不只是主張「新政治思想史」的史家（即使他們只關心政治思想史「是」什麼），或局限在宣稱是方法論意圖的文章，才關心這類問題。本文試圖建立的思考的起點是將方法論視為學術成員的行事規則，當這組規則（可能是複數）受到挑戰時，對學術社群的意義是什麼？對非西方學界的意義？應如何理解？因此，才會將「是」什麼的問題轉化為「作為」什麼，至少為這項理解的烈能與渴望，尋找說服的論據。至於這項問法是不是或為什麼是或不是政治學者的專，利就是是筆者所能想像的問題。

本文提出這個問題所指的是政治思想史「應該」及「能夠」作為什麼，至於「實際上」作為什麼則必須針對個別政治學社群進行研究，請參見本文第Ⅲ部份第 2 小節，關於政治思想史與政治學科史的討論。

社群成員基於擁護或反叛，為某理論提出論述時，他所展現的就是該理論在整體學術社群生態的特定區位的認識與評估，其中同時蘊含的是對整體學術社群生態的認識與評估。雖然《新思想史》界定「是」什麼可說服社群成員遵守特定的論述規則及與其相配的制度性安排，並從中重新獲取社群身分的認同，是重建社群結構的捷徑。但在這場說服或終生抗拒的過程中，「是什麼」的答案則是由學術社群成員，按照社群生態之建立、維繫及變遷的需要來決定，從最能滿足多數成員之認知的答案，推演出「作為什麼」

第二項理由是：政治理論與政治學社群的形成與變遷，除了互為建構之外，還存在著互為脈絡的關係。當社群成員從事教學及研究活動時，均有意識地瞭解到他所執行的是與既存社群關係相互依序的活動，已構成生態環境的一部分，這些行為唯有在特定脈絡而非真空中，才能取得意義。因此，他更必須在常規的論述活動中，負責地區辨出論述在個別脈絡及層面所產生的意涵。因為唯有如此，社群成員才得在常規論述活動中瞭解到，儘管他所操持的是專業論述語言，但透過語言所展現的是對既存社群關係的擁護與反叛，他們有義務在理論與社群生態之構成關係的認識上，進一步地從這項關係在教學及研究上，為每一代的新進成員傳承政治知識，告訴他們課程及理論在社群生態中扮演的角色，到底「作為」什麼，並要求他們誠信地且包容地面對來自社群內外的論述行為的多重後果。

在政治學社群生態中，「政治思想史」到底「作為」什麼？如果上述兩項理由已充分說明這樣的問法一辨識政治思想史或其他政治理論如何構成政治學社群一是重要的、有意義的，接下來，在辨明學術社群的構成要素之後，便可明瞭上述問題的解答即在於政治學社群與政治社群之間，同樣存在著互為建構、互為脈絡的關係，政治學者是這項關係的翻譯者與傳播者，「政治思想史」則是基於這項關係所建構的關於整體政治社群的歷史。

## II、「社群」的辨識

「正確的」，我指的不是「真的」。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是

能讓我們的思路隨著問與答的過程而有進展的答案。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問題的「正確」答案往往是「謬誤的」

—村靈·鳥《自傳》

本文至今一直對於「社群」的定義感到遲疑。無論是孔恩「典範」或 J. G. A. Pocock (1989: 14, ft6) 的「後典範」理論<sup>(註一)</sup>，都將同時有利於及不利於政治學社群的辨識。本文所要論說的是：從生態觀點來看，政治學社群是因應政治社群之運用產生的次級社群，兩者的關係及其理解均可對應於政治理論與政治學社群的互為脈絡的關係。以下將提出進一步的分辨：

A、典範權威之「獨佔」意涵不利於政治學社群的辨識。政治社群先於政治學社群而存在，「政治」吸引人們的注意，進而思考「政治」，產生政治理論<sup>(註二)</sup>，而後出現以思考政治或「生產」政治理論為專業的行業，最後乃出現政治學社群。因此，流通於政治學社群中的（多元）典範及其個別論述，具有同時作為學術社群及政治社群之典範（或論述）的特性<sup>(註三)</sup>，不以操持該語言為專業的人，也可以公開自由地使用政治學典範。既使基於專業

---

註一一： Kuhn 說「一個科學社群由一個專門科學領域中的工作者組成。他們都受過同樣的教育與養成訓練；在這過程中，他們都啃過同樣的技術文獻，並從這些文獻中抽繹出相同的教訓…結果，一個科學社群的成員認為他們自己是唯一負有追求一套共有的目標的人，包括訓練他們的接班人，別的人也這樣看待他們。在這樣的社群中，溝通相當完全。」(1991: 236) Pocock 說「學術社群是由某項特定的學術研究典範及其相關的研究活動概念所構成 (the concept of that inquiry itself acting as a paradigm)。一個人之所以成為學術社群成員，只是因為他已假定投入該類研究並承認其典範的權威性的角色，這項認定不因科學革命之重建而失真。所以，特定研究典範型塑了科學社群的語言及思想。」(1989: 16)

註一二： 本文關於「政治理論」(Political theory)的用法，採用較寬鬆的用法，即不以後設理論的標準，而以生態觀點來衡量，只要針對「政治」提出見解並在意見市場持續流動引起再論述及行動，在本文都稱為「政治理論」。因此，筆者認為這樣處理的「政治理論」，稱為「政治論述」(Political discourses)會較為合適。

註一三： 有關政治學語言(概念)及政治語言(世界)的互為建構但緊張關係的討論，可參見 Terence Ball 關於《批判概念史》(critical conceptual history)的討論(1988: 2-17), James Farr (1988, 1989), Quentin Skinner (1988c), James, B. White (1984: 3-8)。

論述之需要的聲稱，以自視正當的途徑，將論述所指稱的就不局限於特定層面的對象，自層次交疊的脈絡中抽離出來，再以「典範」概念之「獨佔」面來辨識政治學社群，「典範」因此反而不利於分辨與標示政治學社群，更容易模糊它在政治社群中的特定區位。政治學社群因此成為自成格局且封的活動場域，政治理論成為純粹社群成員的心智活動，不具重要的政治或社會意涵，只需從後設的角度加以理解或評估。這樣為了強求辨識反而造成扭曲真象的後果，當然是為本文所明白反對的。

B、典範的「共享」意涵正產生相反的作用。可從以下問題來說明為什麼「典範」是學術社群標誌？為什麼政治學典範未能名符其實地專屬特定人員？先看孔恩對「典範」(Paradigm)的使用。

“典範”這個詞有兩種不同意義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一特定社群的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與技術等構成的整體。另一方面，它指涉那一整體中的一種元素，說是具體的問題解答，把它們當做模型或範例，可以替代規則作為常態科學其他謎題的解答基礎(1991: 234)。

Charles Tilly 對這段說明作了適當的「翻譯」，他指出任何學科都包含以下四項要素：一組自我辨識的成員、一系列自認重要且可解答的問題、與解答問題相關的證據、正當的解答程序(1991: 87)。這些要素是基於對學科典範的信仰而展現出的團體信念(group commitments)。唯有共享一組謎題、解謎規則及解謎目的一精煉典範的一群人，才能稱得上是團體或社群(community)。政治學社群的成員是所謂的「政治學者」，他們所共享的謎題、解謎規則及解謎目的是什麼？這些共享的基礎賦予政治學社群什麼樣的特質？我們必須從政治學者的社群活動來解答。

人類對「政治」的討論及行動，向來不因「政治學者」這項新興行業<sup>(註一四)</sup>的出現與興盛而有退卻。無論將政治理論視為一種

---

註一四：直到一八六〇年後，英國劍橋大學的課表上才出現關於政治學的課程(Collini et al. 1983: 344)。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期間，美國每年只

政治語言現象或意識型態<sup>(註一五)</sup>，它是人類認識及解脫自設之困局 (prodicamont)的途徑<sup>(註一六)</sup>，它傳達人類在具體情境中的意識反應 (consciousness responses) (Schwartz 1976: 3-14)。政治理論是具備敏銳之歷史感及實際政治知識 (Practical political knowledge)的思想人物(thinkers)的政治論述<sup>(註一七)</sup>。但這些體現人類生活歷史的論述，則需仰賴政治學者的精鍊與傳播。如果「政治學者」作為一項行 (profession)，他們是專精於或以特定語言從事及傳承這項思考，並以此營生的特定團體稱呼。若「政治學者」是一項志業 (vocation)，即從事這項思考是一項召喚，無可推卸的義務，則「政治學者」將與古典意涵的「公民」(citizen)<sup>(註一八)</sup>應為同義詞。即使

---

產出三至四位政治學博士。至一九〇〇年僅有五十至一百位政治學專任教師。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每年產生超過七百倍政治學博士，共有八千四百位教師 (Ricci: 1984: 7-8)。

註一五： J. G. A. Pocock 與 Richard Ashcraft 曾針對政治理論的性質及相稱的政治學方法論，發生過爭論，請參見 Ashcraft (1975a, 1975b, 1980) 及 Pocock (1975a)。Neal Wood (1978) 對政治理論的性質及其解讀方法，可說是結合二人的說法，請參見 346-50, 350-52, 358-61, 364-65。然筆者以為爭論不等於於岐見，反而可能是誤解。Pocock 與 Ashcraft 的爭議值得進行更細緻的分辨，並加入 Quentin Skinner (1978: xii-iv) 的看法。

註一六： Oakeshott 認為政治哲學的特質之一就是對人類處境採幽暗的看法：人類處於黑暗中，生活就是一項困局，政治秩序是人類得以解脫困境的設計。因此，瞭解困境的路徑、人類完成自身救贖的活動及心態與想像的品質、政治機構之權力的真正本質、解脫的方法與包容力等皆是任何政治哲學必須討論的課題。每一部政治哲學經典都源自對困境的新看法，都是人類救贖的曙光或補救之道 (1955: xi)。

註一七： 其實只要翻開任何一本政治思想史教科書的目標，都可輕易地看出，只要被視為是震古爍今的政治典籍，極少是基於學術意圖或出自學術大家。但當代政治學的發展似乎已不容許非專業人員再提出「政治理論」。美國政治學的行為主義浪潮及日後趨勢，將這項發展作了最鮮明的展露。如果有人因此認為，當代政治學教學內容就是當代學者的理論，以往的學說已成歷史，沒有必要當作核心主題，想必也是過激的說法。因為若以流行情況來衡量政治理論，那麼任何理論遲早變得過時，政治學系的教師與學生可能隨著每一季的流行而更換行頭？過分強調政治理論之當代性或非歷史性或所謂「重方法主義」(methodism) 對政治教育的負面影響，請參見 Wolin 1969: 1069-77。如果以本文主張的生態觀點來看，衡量指標應當是政治理論如何構成及影響學術及政治社群生態，至於發表年代或理論家的社群歸屬次要。

註一八： 關於古典意涵的「公民自概念，最完成的展現就是 Thucydides 的

日後政治理論逐漸成為政治學者的專屬經營對象，由於同時身為政治學社群及政治群的成員，在提出專業論述時，很難刻意區辨或控制所指稱的社群對象，使得論述同時在兩個社群中產生意涵，政治理論的生產者與傳播者必定且同時是學術工作者及政治行動者。

政治學者憑藉逐漸形式化的語言，成為這兩個社群交往的媒介與翻譯者，包括社群歷史及社群語言的相互滲透與詮釋。因此，政治學者所共享的是政治社群的歷史及其中所蘊含的行為規範與「政治秩序」概念。這些共享的內涵是由政治學者與其他的政治社群成員共同創造出來的，當然無法被政治學者所壟斷。政治學者及所由構成的政治學社群所不同於其他成員的是，透過形式化的論述去服從及體現典範，也就是透過「術語」（technical、vocabularies）按照政治社群的歷史所明示或暗示的解謎規則，從事特定謎題的解答活動。其他成員則選擇他們熟練的途徑，進行同樣的活動—詮釋及創造政治社群的歷史。

本文區辨政治學社群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呈現以「政治」作為教學及研究對象的專業工作者，他們以什麼方式及基於何種目的從事政治知識的傳承及其可能結果。這項辨識與展現必須對照政治社群的歷史，因為它作為政治學社群之活動的意義源頭，而後者活動所指則是創造、詮釋及傳承前者的歷史。本文承接上述生態觀點進一步推論，當某項理論被提出或挑戰，這些常態論述活動蘊含的不僅是對該理論在政治學社群主態的特定區位，亦包括對政治學社群與政治社群及其關係的認識與評古。簡言之，筆者將政治理論視為政治學者基於對雙重社群生態關係的自覺而進行的論述活動。那麼就會出現：政治生活→政治困局→政治學者→政治理論→政治學社群→政治社群→政治困局→政治學者→政治理話……的層層剝離又環環相扣的關係。這種在層次交疊的脈絡中，不斷浮現的力的作用，「權力不是某種可以獲得、奪取或分享的東西，不是某種可以保留或喪失的東西：權力的實施乃是通過無數的點，透過不均等的、運動力關係的變化得到實現的。」(Foucault 1990: 81)

但這項層層剝離的過程，並沒有純粹的起點或終點，不是像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 將政治秩序的建構起點擺在「人性」上。縱使政治學者或其他公民所面對及提出的是關於既存政治秩序的認識與評估或行動，但既存的政治秩序即已夾雜了包括前人與當代的論述與行動，很難從中找到根源，或區辨出影響的源頭。此外，從本文所主張的生態觀點來看，關於政治理論的學習、教學或評估的目的，在於具體呈現出政治學者及政治理論如何在雙重社群的交疊多重脈絡中產生交互作用，分析重點在於「過程」及「結果」而不在挖出根源。畢竟分析的活動與目的是在這樣的脈絡中進行與滿足，是指既存政治秩序在政治生活之各層次的擁護或反叛，既使在月球也只能看的地球一面，何苦因此去尋找地球外的支點？因此，這項剝離的過程不在化約出所謂「基本成分」或「自然狀態」，因為政治理論的提出是一項既定生態，它的影響力終究是指向也是在雙重社群關係中運作，無論理論家的意圖或學習者的需要，最後還是必須回到既存的而非完美的政治生活中，才得理解與解釋。

這部分的討論說明了政治學者、政治理論與政治社群的關係，對辨識政治學社群的重要性。在確定政治學社群的區位及生態涵後，接下來就是應用的可行性，即用以回答本文主題「在政治社群中，『政治思想史』作為『什麼』？」這就涉及學術社群的構成要素。

### III、政治思想史、政治教育與政治學科史

好的歷史學家就像童話裡的巨人，他知道無論那兒，只要嗅到人肉的氣味，獵物就在那裡。

—布洛克《史家的技藝》

沒有劍為依靠的契約，只是一組空洞的文字，根本無力保護任何人。

—霍布斯《利維坦》

Pocock 等人所倡議的《新思想史》至少是指向政治思想史之教學及研究等相關活動，所圍築的次級社群關係的核心，其他層

次的社群關係也勢必隨之調整。筆者從內部即社群成員對自身行業身分的認同與辯解，而非從外部尋找社群典範（無論是一元或多元）來推演出政治學社群的構成要素。這項認同勢必展現於常規論述活動中，即指成員們執行行業的情況及判斷。「政治學」作為一項行業至少是由三項要素所構成，也是構成政治學社群之既存生態的三個三支點：a.訓練社群成員執行行業；b.解釋該行業的「過去」；c.規範該行業的執行。

筆者將《新思想史》視為重建政治學社群的策略，就透過方法論上的挑戰與說服，首先建立執行政治思想史研究之規則的正當性與權威性，然為取得全面的優勢地位，在方法論的火力支援下，《新思想史》勢必要在其他兩方面發動攻勢，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這就是「政治思想史『作為』什麼」的行動意涵：a.以「政治思想史」作為政治教育；b.「政治思想史」作為撰寫學科史的示範。本文以下將主張：唯有將政治教育及政治學科史視為政治學教育的核心內涵，即將政治社群與政治學社群的歷史，納入教學，使得無論政治學者或政治學系學生，在執行行業或修習課程時，所必須學習與面對的是，《新思想史》所建構的關於前人的生活歷史。屆時它所引發的變遷將不限於政治思想史領域，而是整個政治學社群的常態論述活動，即可完成政治學科的「革命」或重建。

## 一、政治思想史作為政治教育

### A、什麼是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

從社群成員之論述行為的性質及目的來看，社群的建立與成員之論述具有相互建構、共存共變的關係。教學與學習就是基於這項關係而進行的論述活動，政治學系提供學生透過必修課，所要學習也是唯一能學習的就是由前人之發見與理論，所建構的關於「社群」的歷史。這裡所指稱的「社群」具雙重意涵：政治社群與政治學系。一般學者所指稱的政治教育是以前者的歷史為內

容，一般公民為對象(Oakesott 1962: 128-33)<sup>(註一九)</sup>；後者的歷史即為下一部分要處理的政治學科史(disciplinary history)，即以政治學系學生為對象。

到底「思想史」對政治教育的重建有何助益？首先，我們要瞭解到，政治社群的歷史即政治教育的內涵是由社群成員與政治學者共同創造與傳承，那麼透過政治教育所要學習的就是政治思想（理論）史。一本歷史彌堅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教科書，在第一版序言說：

這本政治理論史的寫作，係基於一個假設，即政治的理論本身說是政治的一部分。換言之，政治理論不是一種外在的事物，而是政治本身所由存在的那種社會環境中一種正常的產物。凡是對政治行動的目的，對達到這種目的工具，對政治局勢的可能結果與其必然性，和對政治目標所加的責任，加以思索，則這種思索說是政治過程的一種必有的一部(Sabine 1973)<sup>(註二十)</sup>。

政治理論吸引人們注意並成為日後政治學系必修課的因素，在於它真正地影響且構成政治社群的一部分，因為人們提出政治論述的意圖是深植於政治社群的生活歷史中，其思考的立足點是基於作為政治社群的成員，對政治秩序的建構、維繫與變遷的認識及評估。由於前人的政治理論本身之當代及跨時代的影響力，構成亦解釋當前的政治社群生態，所以構成政治教育的內涵。政治學社群所致力於保存、修改及應用的正是這些前人的思考。那麼政治教育指涉的知識傳承過程與對象就是一從縱面（歷史）與橫面（哲學）學習行為傳統及傳承政治知識，這項特質可對照前述之政治理論的當代性與歷史性。

面對政治教育的內涵與目的，大學教師的責任是什麼？

---

註一九：例如 Esquith 指出傳統的政治教育問題：如何取得私人生活之需求與身為政治成員之公共責任與義務間的平衡？這項平衡的政治特性？個別公民如何透過前政治訓練（prepolitical training）滿足及分享政治生活責任？(1992: 249)。然傳統的公共領域已被國家權力分割成許多專化的政策制定領域。各領域中有其官方專家、諮詢委員會及消費者團體。國家已使公私界線模糊，對公共政策的顧客或消費者而言，如何在面對複雜、專業化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培養對專家權威產生真正的信任而非盲從，即成為現代政治教育的的重要問題(249-53)。

註二十：這段翻譯採用王兆荃一九七四年（幼獅）的中文譯本。

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認為他（她）們所要傳送的絕不是世俗流行的成見或教條，他們真正要展現給學生的是對思考模式即論述典範或語言的熟練，而這組語言正構成文化中的核心成分。一個大學教師的責任即在於教導學生及示範某一特定論述典範，由於該典範與文化具有整體不可分的關係，學生從中以具體的仿效與實踐，學習文化，理解行為傳統，感受自己身處時間之流。具體的教學方式則是透過閱讀建立論述典範的文獻 (1962: 312-4)。《新思想史》所指涉的「政治思想史」，對此可提供多少幫助？

### B、「政治思想史」作為一門必修課

從《新思想史》<sup>(註二一)</sup>的主張來看，「思想史」所指涉的正是政治教育相同的內涵：政治群的論述歷史。它並提供正當的處理方法，使得前人在歷史情境中的思考活動能重現於當代，對政治教育的目的一學習行為傳統及傳承政治知識一的實踐，有著極為關鍵的助力。

《新思想史》主張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分析單位是政治言談 (political speech)。它指涉政治活動、制度與價值的結構及所有與這些制度及價值有關的活動，因為這些也是政治活動所要支配及調和的對象。所以，只與政治有關的活動，其間所使用、開發、倡議的詞彙及價值，都將成為當時政治語言的一部分，自然是研究者的分析對象。其次，任何政治言談不是自我封閉的，將不可避免地與其他政治言談產生接觸。當諸次級的政治語言進入政治言談，它自然地會帶入原領域中的諸典範，不只發揮原有的政治功能，還鼓吹既存政治社群中的權威分配及定義，並繼續推行原有次政治領域的價值假設 (value-assumption) 及思想形式

---

註二一：如果洛克 (March Bloch, 1886-1944) 謙稱《史家的技藝》「只是一本屬於一個喜歡反省日常工作的藝匠的備忘錄，一本屬於長久使用尺及水平儀一而不敢想望自己是個數學家的職工的記事本。」(Bloch 1989:26) 就筆者所知，Pocock (1987) 的作品堪稱是《新思想史》的操作手冊，其中詳列標準研究對象、程序、目標，至此《新思想史》已擺脫爭論而進入實踐的階段，特別該論文作為論文集的首篇，等於該書的寫作及論題，寫下指導原則與作業規定。

(thought-form)。多元的社會勢必出現多元的語言，使得每項語言都帶著它們關於權威的定義及分配的特定偏見(看法)，趨合並形成一項高度複雜的語言，其間多項典範並存，彼此辯論，並在概念、詞彙及意涵上相互吸納競爭。若再加上所有的二度陳述(second-order statements)，包括對語言的解釋或開發，那麼，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豐富對象就呼之欲出——一組層次交疊意涵多重的複雜政治語言現象(Pocock: 1989: 22-3)。

如何辨識歷史中的政治語言或思考活動？政治思想史家首先要承認「思考是人類一項複雜活動，其不完整、不一致，不穩定及試圖將之消弭的努力等，正是思考的永久特性；它用以解決問題而非建構封閉的形式遊戲；它所運用的語言是人們用來理解自身的生活經驗。(Dunn 1980: 16) 因此，區辨論述者所使用及處身的語言時，必須要顯示這項語言如何典範地(paradigmatically)規約他說什麼及怎樣說？所包含的假設與意涵？根據語言所提示之路線的使用結果？討論過上述問題才能考慮作者使用語言的真正結果。我們為了證明作者正在使用某項語言，「必須先得知其構成的獨特模式及風格，並學習去使用它，直到我們能在使用中預測它的推論方向。藉此我們探知語言的文化及社會根源、政治的及語言上的假設模式(modes of assumption)、意涵及自身所包含及所傳送的曖昧。」(Pocock: 25-6) 因此，「瞭解一項語言就是去知道能作什麼，瞭解一位思想家就是去知道他打算使用語言去作什麼；瞭解一項語言或一位思想家的首要條件就是學習使用這項語言。」(Pocock: 28)

但由於社會中使用的語言十分多樣，政治論述所發揮典範功能是多重的，是同時存在且難以完全區辨的，這表示每項政治言說所承載的意涵與暗示是十分沈重的。即使言說的層次已被熟練地使用與探究，藉著深度討論及批判性分析所建立的論域(universe of discourse)也是多重的。這就構成政治「思想」「史」。「因此，在任何時刻，一項既定言談的意義(不可避免地是多元的)必定是被安置於一項典範網絡中，其間包含多重脈絡，言談的語言力量無法由自身決定；如果我們要以自己的語言以陳述的方式追溯某項言談的歷史，我們必須區隔出言談所產生的脈絡，

因為言說從來就不是自我設定的(self-locating)，我們必須將之安置於最有利於當代詮釋的網絡中。」(Pocock: 28-9)

Quentin skinner 也認為「我並不完全將焦點放在主要理論家，而是將歷史文獻廣泛地放在這些理論源起的一般性的社會及知識母體 (matrix)。一開始，我討論與這些理論之源起及意圖最相關的社會特徵。因為我認為政治生活本身為政治理論家設定主要的問題，使得特定範圍的議題成為可議的及相關問題引起主要的爭論對象。」任何特定時刻的規範詞彙的本質與限制，將會決定特殊問題的提出與討論方式 (1978: x-xi)。Skinner 有信心地指出，這項途徑使我們真正地理解典籍但又不單靠閱讀典籍的是什麼？

它使我們區辨出作者寫作時在作什麼(what their authors were doing writing them)。我們可以開始看到的不只是他們所提出的論證，更包括其中的問題及試圖提出的答案，及他們對既存政治爭論之流行假設及習慣的接受與承諾或質疑與詆毀。為了將這些論證視為特定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瞭解論證所處的社會背景。為了辨識出論證的確實方向及力量，我們必須對當時流行的政治詞彙有所認識。為了瞭解作者提出的問題及所使用的概念，即要瞭解他的寫作基本意圖，也就是要藉著他說什麼引出他到底已經或未能表示什麼。當我們以這種方式將典籍安置在適當的脈絡，我們不僅提供了詮釋的歷史背景，我們也已經置身於詮釋之中(xiii-iv)。

人類基於作為政治社群的成員，對政治秩序之建構、維繫與變遷的認識及評估，提出在歷史之各個層次產生不可預期之意涵的政治論述，形成人類的行為傳統。其間蘊含不同世代對「政治」的思考與行動，這部「政治理論史不是就同一問題提出不同答案的歷史，而是問題或多或少都一直在變而問題的答案也跟著一直在變的歷史。」(Collingwood 1985: 70-71)如果問題與答案都一直在變，人類如何期望以歷史作為教育的素材，他們能從中學到什麼？其實，歷史的「過去」是活著的過去，藉著歷史思想的方法，過去得以生存在現在之中。從某一種思想方式到另外一種思想方式的改變，並不等於前一種思想方式已經死去，而是經過發展與批

判後，加以整合融化仍然存留在一個新的思想環境中。「如果 P1 這個符號代表某個歷史時期的特性，P2 這個符號代表 P1 之繼起者所具備的相互對應而不相同的特性，那麼繼起者所呈現的特性絕不是出自一個純粹的 P2，而總是出自一個帶有 P1 之遺留的 P2。」(Collingwood 1981: d 229-30, 1985: 101)

基於這樣的信仰，《新思想史》透過自主的方法論，將這個組層次交疊意涵多重的人類現象，安置在可解釋及可傳承的分析架構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學者必須自覺地經由教學活動，將《新思想史》所意圖指涉的現象及認識途徑，化為學生學習政治社群歷史的方法與目的。本文認為，從指涉對象的一致來看，政治思想史教學就是政治教育；從手段／目的的關係來看，政治思想史教學是最有效的政治教育；從辨識政治學社群的需要來看，政治思想史教學使政治教育成為這項辨識活動的指標，即從政治社群歷史的學習，分辨政治學社群的「疆域」。

筆者認為，雖然政治教育所指涉的是政治社群的歷史，從政治教育中，可提醒政治學者所處的論述背景，是一組具有實際取向的政治典範所圍築而成的論域。如果以孔恩的用法，政治學社群成員接受政治教育的作用，如同科學家透過典範學習理論，

典範做為傳達理論的工具這一角色。典範扮演這一角色，它的功能是告訴科學家自然中那些事物存在、那些事物不存在、以及這些事物如何活動太複雜太多變而難以隨意探索，這份地圖對科學的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等同於觀察與實驗。……典範不止給了科學家一張地圖，也給了他們製圖指南。在學習典範時，科學家同時學到了理論、方法及標準，它們通常以難分解的形式進入學者的腦中(1991: 163)。

當這項典範成為社群成員之行事規則與意義之源頭，政治學社群與政治社群的界線其實是既清楚但又是必須跨越的。

## 二、政治思想史作為撰寫政治學科史的示範

## A、撰寫政治學科史的必要

政治學教育指涉的政治學社群的歷史，是一部關於政治學社群成員的論述活動紀錄。對政治學社群而言，政治社群的歷史即政治教育是進行論述的必要背景，這項意義對其他政治社群的成員是一致的。然而，當政治學作為一項行業，並逐漸具有與政治社群有所區辨的專業論述活動時，政治學社群的歷史，對政治學者的論述而言，提供第二項重要的脈絡與意義的源頭。

筆者認為，政治學社群的歷史絕不可能在隔絕與政治社群之交往的情況下產生，其學科史的撰寫亦不可忽略政治社群所提供之意義網絡。這兩個社群的成員由於論述對象的高度重疊，自然使得二者的歷史在互為脈絡、互為素材的條件下建立。因此，至台灣政治學科史所紀錄的絕不只是社群成員針對內部結構的論述活動，例如提出、引介理論、從事研究、發表論文……等，與政治社群的交往行為及對學術社群的意涵也必須包含其中。畢竟我們期望透過學科史，所要瞭解的是台灣政治社群如何與政治社群建立起互為建構與互為脈絡的關係，再從這項關係去解釋過去政治學者的學術論述。所以，對政治學者而言，他無法迴避地同時面對雙重社群所提供的意義體系（典範），透過政治教育學習了政治社群的歷史，這至多只完成一半的訓練，另一半是來自學術社群之發展所蘊育的專業論述歷史，這部份卻始終未能列入國內政治學課程。

此外，政治學者先天但日漸明顯的政治行動者的角色，及其政治學者論述之不可預期與掌握的政治意涵，使政治學者必須更審慎地透過學術社群的歷史為其論述活動取得意義及自省的基礎<sup>(註二二)</sup>。因此，學科史的解釋與撰寫雖是以政治學者的專業論述為對象，但必須對應政治社群的歷史，以作為其中次級社群成員的關係進行撰寫。

一部傑出的學科史將記錄該學科所有研究途徑、研究傳統、

---

註二二：對物理學者來說，物理學史既是學術社群也是人類社群的歷史，因為他所經營的對象如終如一，不因論述而有所改變。但由於自然科學與政治學之經營對象的不同性質，導致執行行業及撰寫學科史的方式及結果也有所不同，請參見 Dryzek and Leonard 1988: 1249-51; Kuhn 1991: 191-8。

理論及方法在歷史中的成敗，就看它們是否成功地解決所提出的問題，即解決問題的能力高低。學科史因此可在二方面，提供學科進步所需的助力：方法論上一學科史展現出政治學是一項歷史學科，其間出現的學術論述均在特定情境中指向政治生活的重要問題，其盛衰就看它能否貼近問題；理論上一政治學是關於為什麼我們現在及曾經如何及應該生活在一起。理論是歷史實體 (historical entities)，它在時間之流中浮沈，受限於時間，即是在特定脈絡中提出。熟悉學科史的成員將深刻地理解到當前社群生態的形成與變遷，必須從歷史中理解理論的缺陷，培養選取典範的能力，而學科的進步與否就在審慎的認識而非獨斷中產生 (Dryzek and Leonard 1988: 1257-8)。(註二三)。

學科史所呈現的應當不只是專業的也是生態意涵的「政治學者」的活動，即展現政治學者的雙重身分：公民與學者。實際上扮演的不等於預期扮演或角色，因為你無法抗拒身處特定生態中且構成其中一部份的事實，既使你清楚瞭解且以此為專業。這種論述活動及其詮釋的條件是不因社會身份而有所不同。

## B、政治思想史作為政治學科史的寫作典範

政治學者是學科史中的行動者，從社群內部去看，其論述的專業特性是不需要強調的，因為該特性是所有成員共享且樂於使用交往的媒介。在第 II 部分即以指出，這項共享語言的特性是任

---

註二三： Dryzek 與 Leonard 這篇文章的另一個重點是：作者提出兩種撰寫學科史的途徑—Wdhigs 與 Skeptics (1252-7)，這也成為日後 James Farr 等學者(1990)的討論及作者之回應的引爆點。這場論爭與本文較為相關的是其中 Raymond Seidelman 對作者只從社群內部因理論、方法而形成的多元現象來看政治學科史，只掌握到片面的真象，更需要從外界即政治社群的角度去問：我們從學科史中能學到什麼？有何重要性？有沒有除了政治學者以外的人關心這部歷史？我們應該如何關心，如何使它與前輩的關懷有所關聯？有過重要貢獻試圖教授的對象？政治學者是否對當代政治對話之基本議題的形成，有過重要貢獻？(Farr et al: 596-7)。「我們這項行業之存在的歷史基礎是一項關於構成以下課題的定義：值得考慮的政治立場、值得使用的語言及值得批判性的參與的公共議題。我們的學科史就是應當在前輩的提示下，再度提出這些問題。」(600) 筆者認為，若這些問題問題放在本文中，就等於一個問題：政治學作為一項行業的生態意涵？

何稱為「社群」的團體的基本條件。《新思想史》所規範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就是針對政治社群中這類共享語言的多元現象，提供人類論述之多重意涵的必然性的瞭解。政治學者透過政治思想史及學科史也可藉以檢討自身論述的多重但無法預期與控制的後果，無論是對學術社群或政治社群。

將學術論述視為趨向權威結構的活動，即對既存社群生態的權威的擁護或反叛。學科史與政治社群史的撰寫策略是一致的。首先，將高度形式化的理論活動視為一項使用語言工具進行權威（典範）之溝通與分配的活動。人們藉著溝通語言體系進行思考，這些體系幫助使用者築構出他們的概念世界及權威結構或相關的社會世界，概念及社會世界可當作互為脈絡的關係，可在各自脈絡中取得自身具體形象。因此，個別人物的思考可視為在一項典範體系中的一項社會事件、一項溝通行為及回應，以及該體系及其對應世界之變遷過程中的一項歷史事件及一個時刻，典範體系及其對應世界彼此型塑及影響(Pocock 1989: 14-5)。由此看來，學術論述與典範的關係，如同政治活動與憲法，互為脈絡，共存共變。論述的目的在於權威地規約常態論述活動—教學與研究，並賦予社群發展所需的意涵。

但由於政治典範的特性，使得有關典範的使用也因其多重功能及起源而變得多元曖昧。所以一組政治陳述可能傳送多重來源的多重意義，。這項特性對史家而言，即產生一項普遍規則：一份歷史文件可能傳送多重意義，包括非（溢出）作者意圖傳送的意義。因為作者的意圖本身就是曖昧的，所使用的語言本身更是如此。此外，這些語言是由社會所賦予且已深植於使用與意義的脈絡中，其多重歧義絕非作者所能控制，所以可能傳送出非本人意圖的意義。不可否認的是，他不可能傳送當時讀者無法理解的意義，或使用當時不可能用以傳送意義的語言。但是，除以上兩者外，作者仍有可能傳送出他無法預料或控制的意義(Pocock: 23)。

一旦作者無法控制其政治陳述可能發生的意義，包括二度陳述，那麼，就表示作者無法充分掌握發言的意義；其次，將會出現關於這項陳述的發生於多重層面產生多重意義的一部多重歷史

(a multiplied history)；最後，這部歷史將包含遠超過作者意圖所預期包含的時間、事件及過程，其意圖僅占據一小部分。一旦這部歷史真是如此，那麼，作者進行論述所遵循的典範將遠超過意圖或非語法力量所造成的影響。因為我們唯有瞭解作者的論述工具，才可能瞭解他要說什麼、說了什麼、被認為說了什麼或其論述對既存典範結構產生的修正或改變的結果，我們的分析單位是政治言說的典範。典範規約作者傳送及接收意義的層次，典範所變遷也牽動這項層次(Pocock: 24-5)。

以上有關政治論述的性質及其多元意涵之不可預期，對政治學科史的撰寫，將有啟發性的幫助：a.過去政治學者之學術論述的瞭解，必須從其所源出的典範著手，包括外來學說或研究，並呈現出多元典範之間的競爭、對話與消長。B.這些競爭、對話與消長如何進出政治社群，成為有影響力的政治論述或促發重要的政治行動。因此，根據《新思想史》提示的作法，政治科史必須參照政治社群的活動。

國內政治學界應認真考慮撰寫「台灣政治學史」的可能性與需要。撰寫科史並不是累積眩目的研究成果後才可以進行<sup>(註二四)</sup>，學科史是學術社群之反省與進步的紀錄，它提供現有成員及潛在

---

註二四：這種想法與國內學界從不將本土的政治論述及其現象，納入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作法是一致。長期以來，國內政治學界雖然未明言，但在教學及研究上一直表現出這樣的傾向：「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哲學」。因此，在整個政治學社群中，政治思想史變成所不包的詞彙，但卻是從不曾適用於本土思考現象的詞彙。最常見的說法是：無論是近代中國或台灣只有「思潮」而沒有所謂「思想」的存在，自然不可能出現針對本土而進行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因為缺乏相稱的分析對象，所以政治思想史研究永遠只能用來討論西方世界，本土現象永遠無法嵌入這個領域？首先「思想」與「思潮」有何差別？前者的抽象層次比後者高？前者的抽象層次是不是又比「哲學」低一些？所以這三者的抽象層次關係是：「哲學」>「思想」>「思潮」。加上中國人向來不擅長抽象思考，因此在近代不僅缺乏政治哲學，連政治思想都沒有，更不說有政治思想史？第二、前述關於「哲學」、「思想」及「思潮」的分辨及關係，能否成立？或是只是藉著名詞玩起自我安慰的團體遊戲？第三、近代中國及台灣真的不存在「思想」而只有「思潮」？筆者對這些問題的答案與建議將同時提出二只要政治論述，就構成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象。筆者主張應以《台灣戰後政治論述史》為主題，進行本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請參見本期《東吳政治學報》研究通訊：「《自由中國》半月刊中關於憲政論述的歷史分析」。

成員涉入社群生活、獲取認同與歸屬感的路徑，一個沒有歷史的紀錄的社群，其成員藉由學術論述建立的交往關係將缺乏恆常的基礎。筆者在此提出一構想，建議以《台灣戰後政治學社群之生態研究 1945-1995》為總主題，完整地探索台灣政治學社群及政治學者如何以政治理論建立與政治社群的界線，及藉此產生的交往與對各自及其他社群的影響。

這是一項歷史研究，例如我們必須根據史料探究必修課之規定所展現的是學術社群的共識或是政府的需要？政治學社群成員如何產生《思想史》或其他課程作為修課的共識？這項共識的內涵？政治學系必修課程與政府需要有關？這也是一項關於政治學社群的生態研究，我們期望能從縱面及橫面解釋台灣政治學社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

政治學者是詮釋「政治」為專業的行業，他們雖未能壟斷思考政治的機會，但藉著理論取得型塑政治世界的發言權及日漸明顯的影響力，政治學者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值得自省。研究所需的資料大致分為兩部分，必須兼顧個人、制度、歷史、行動及社群的關係：

一、社群內部：按照孔恩的問法，「一個特定社群（無論是科學的或是非科學的）如何選擇它的成員？這個團體中的社會化過程或階段是怎麼樣的？這個團體把什麼的集體目標；什麼樣的個人或團體的偏差它會容忍；它又如何控制不容許的偏離現象？」（1991: 270）這部分的資料必須包括以下各項：

#### 《制度方面》

如各校政治學系所的創立：時間、申請書、師資一創立及日後增補。歷任主管：學歷、著作、黨及關係、任內人事及課程決策、聘任理由、聘任制度。

#### 《課程方面》

如必修（選）課之規定、修改與廢除：時間、理由。學分數（年級）之規定：理由。教師：學歷、著作、聘任理由。教科書：中外文、數量、理由、與授課內容的關係。授課大綱：形式、執行狀況。授課內容：與授課大綱的關係、與教科書的關係。

### 《考題方面》

如期中及期末考、博碩士班及畢業筆試、轉學考及高普考之相關科目。

### 《論文及著作方面》

如《政治學會》、中研院民族、社科（原三民）所、民間社團（如國策中心、民主基本會）、期刊、學報、著作、論文集。

### 《研究計畫方面》

如申請人、研究計畫書、經費補助單位、研究成果之發表（如出版、研討會）

二、與政治社群之交往：在本文中，政治學者的理想角色就是作為治學社群與政治社群之間的翻譯者。他的任務是設法以他們共有的日常語詞彙進行交談。但是僅將一個理論或世界觀翻譯成自己的語言，並不會使自己接納這個理論或世界觀。一個人必須成為這個理論或世界觀的社群的成員，根據這個理論或世界觀來思考與工作，而不是僅僅以這個社群不懂的話將它翻譯出來而已。(Kuhn 1991: 262-4)。所以，政治學者也同時扮演公民的角色。這方面的資料包括：

與其他學術社群的交往（投稿、開課、演講）：如哲學、史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

與政府（黨）機關的交往：如教職借調政府（黨）機關、史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

與政府（黨）機關的交往：如教職借調政府（黨）機關、兼任政府（黨）職、政府（黨）機關轉任教職、政府（黨）機關兼任教職。

與民間社團的交往：如社團性質、參與形式、程度及結果。

當這項研究能不斷地累積，那麼台灣戰後歷史、政府史、政治思想史及政治學科史，基本上就等於是一項研究，無論就研究對象或研究活動的執行，政治理論與政治學者都是其中的要角。本文期望站在這樣的生態觀點反省及解釋政治理論與政治學者在雙重社群中，其問活動的多元層次及多重意涵的產生及互為脈絡、相互滲透。

## 結 語

話一旦說出來了，即使它只在主體內心深處發出，語言也要為權勢服務。

—羅蘭·巴爾特《法蘭西學院就職演說》

在遠古時代，當戰鼓聲自遙遠的森林中響起來，必然有一支部落會產生反應：然而刺激反應的並不是正義的主張，戰鼓聲才是關鍵性的動員力量。

—加爾布爾雷斯《自滿年代》

本文以「序言」中(Perface)作為副標題的理由是：文中所提出的論證都是待檢證的命題。筆者的寫作意圖在於政治學社群成員之論述行為的自省，展示若干理論上的保證。「政治思想史『作為』什麼」是一項問題，也是一項思考路徑，一種問法。它可用來解釋理論的興衰，也可反映社群之間的競爭關係。但無論怎麼使用，筆者希望「它」能真正地展現政治社群與政治學社群的真正歷史。因為從政治教育或政治學科史中，「在地理景觀的背後、在工具器械的背後、在看來最形式化的文件背後，以及在看來幾乎已完全背離其創建者的制度背後，就是人本身。而歷史研究想掌握的，也就是這些人。」(Bloch 1989: 32)在本文中的「人」主要是指一群作為公民的政治學者。

請容我最後再以孔恩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來交代筆者深知本文的寫作意圖、所遵循的論述典範與規則與寫作結果及國內學界的流行，是有差距的且在意料之中，但不是無法克服的。

在工作中的歷史家，我想與正在玩圖謎的孩子很像，拼圖謎中的每一個小畫片都是方型的；但是歷史家的盒子裡所有的小畫片要多於拼完群圖所需要的。他有資料，或能弄到資料，資料並不完全都有用（不然那會成什麼樣子？）但其中有一部分有用。他的工作是從畫片盒子裡挑選出一套畫片來，使這些畫片拼出的圖片具有一以孩子的例子而言——一幅由認得出的東西合理地擺在一起的畫的要素，或具有一以史家的例子而言——一個涉及可以認得出的動機與行

為的合理陳述的要素。孩子玩拼圖與史家的工作都受到不能違犯的規則的管制。無論在敘述中或拼出的全圖中，都不能出現空白。也不可以有不連續的現象。……不過，這些規則只不過限制了而不是決定孩子或史家的工作的產品。說這兩個例子而言，正確地完全工作的基本判準，說是一種原始的鑑識能力 (primitive recognition)—認出這些小畫片要是鬥攏起來，可以形成一個過去即使沒見過，也感到熟悉的東西。孩子看到的是與過去見過的相似的圖畫，史家則過去見過的行為模式。我相信：認出相似在先，能夠回答“怎麼個像法？”這個問題發生在後。……它是一個整體，不能化約成比相似關係本身更為原始的一套唯一的判準。……在史學中模糊的整體性關係，實際上發揮了貫串所有事實的功能(kuhn 1991: 287-8)。

### 參考書目

- Ashcraft, Richard. 1975a. 'On the Problem of Methodology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Theory 3: 5-25.
- \_\_\_\_\_. 1975b. 'On John Pocock' s "Communication" .' Political Theory 3: 464-66.
- \_\_\_\_\_. 1980.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s 42: 687-705.
- Ball, Terence 1988. Transforming Political Discourse. Basil Blackwell.
- Ball, Terence and J. G. A. Pocock eds. 1988. 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Constituton. Univ. Press of Kansas.
- Ball, Terence, James Farr and Russell L. Hanson eds. 1989. Political Innovat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Baumgold, Deborah. 1981. 'Political Commentar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 928-40.
- Bloch, Marc. 1989. 《史家的技藝》 (The Historian' s Craft)，周婉窈譯，台北：遠流。
- Block, Gisela, Quentin Skinner and Maurizio Viroli eds. 1990.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Univ. Press.

- Collingwood, R. G. 1981. 《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 黃宜範譯, 台北: 國立編譯館。
- \_\_\_\_\_ 1985. 《柯靈鳥自傳》, 陳明福譯, 台北: 故鄉出版社。
- Collini, Stefan, Donald Winch & John Burrow. 1983. That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 Cambridge Univ. Press.
- Dryzek, John S. & Stephen T. Leonard. 1988. 'History and Discipline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1245-60.
- Dunn, John. 1980. Political Obligation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Cambridge Univ. Press.
- Eco, Umberto. 1992a. 'Interpretation and History.' In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ed. Stefan Collini, 24-43. Cambridge Univ. Press.
- \_\_\_\_\_ 1992b. 'Overinterpreting Texts' In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45-66.
- \_\_\_\_\_ 1992c. 'Between Author and Text.' In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67-88.
- Esquith, Stephen L. 1992.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litical Theory 20: 247-73.
- Farr, James. 1988. '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Constitution, 13-34. Univ. Press of Kansas.
- \_\_\_\_\_ 1989. 'Understanding Conceptual Change Politically.' In Conceptual Change and Political Innovation, 24-49.
- Farr, James, John Gunnell, Raymond Seidelman, John S. Dryzek and Stephen T. Leonard. 1990. 'Can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Be Neutra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587-607.
- Foucault, Maichal. 1990. 《性意識史》第一卷: 導論(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尚衡譯, 台北: 桂冠。
- Gunnell, John G. 1982. 'Interpre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Apology and Epistem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317-27.

- \_\_\_\_\_. 1987. Political Theory. Univ. Press of America.
- Kuhn, Thomas S. 1991. 《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s)，王道還等譯，台北：遠流。
- Levin, Michael. 1973. “What Makes A Classic in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8: 462-76.
- Oakeshott, Michael. 1955, “Introduction.” In Leviathan. Edited by Michael Oakeshot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_\_\_\_\_. 1962.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 Pagden, Anthony ed., 1987.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 Press.
- Plamenatz, John. 1963. Man and Society. 2 Vols, Vol. 1.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Pocock, J. G. A. 1962.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econd Series), ed. Peter Laslett and W.G. Runciman, 183-203.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_\_\_\_\_. 1975a. ‘On Richard Ashcraft’ s “On the Problem of Methodology.” .’ Political Theory 3: 317-18.
- \_\_\_\_\_. 1975b.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Univ. Press.
- \_\_\_\_\_. 1987. ‘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etier d’ historien: Some Considerations on Practice.’ In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ed. Anthony Pagden, 19-38 Cambridge Univ. press.
- \_\_\_\_\_. 1989.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Univ. of Chicago Press.
- Ricci, David M. 1985. 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 Rorty, Richard. 1992. The Pragmatist’ s Progress’ In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89-108.
- Sabia, Jr., D. R. 1984.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985-99.
- Sabine, George H. 1973.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4th Edition, Revised by Thomas L. Thorson. Hinsdale, Illinois: Dryden Press.

- Schwartz, Benjamin. 1976 「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張永堂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頁一～二〇，段昌國譯，台北：聯經。
- Skinner, Quentin. 1978.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Vol. 1: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88a.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Meaning and Context, ed, James Tully, 29-6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1988b. 'Motives, 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In Meaning and Context, 68-78.
- Skinner, Quentin. 1988c.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Meaning and Context. 119-132.
- Shapiro, Michael. J. 1981. Language and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1. "How (and What) Are Historians Doing? Divided Knowledge: Across Disciplines Across Cultures, ed. David Easton and Corinne S. Schelling, 86-117. Sage Publications.
- White, James B. 1984. 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Constitution and Reconstitution of Language, Character, and Community. Univ. of Chicago Press.
- Wolin, Sheldon S. 1969. 'Political Theory as a Voc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1062-82.
- Wood, Neal. 1978.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6: 345-67.
- 陳思賢 1989 《語言與政治：關於政治思想史典籍詮釋的一些論爭》，《政治學報》，第十七期，頁一～三〇，台北：中國政治學會。

# What Is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To Be ? — A Preface for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Chen, Jui-Chjng

This essay intends to present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apply it to clarify the crucial question: what kind of roles did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ists play exactly in the processes of the construction, maintenance, transform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munity? There were involved three levels to be examined:

1.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community: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s the origin and the media between the practitioners of a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kind of discourse also constructs the specific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tioners. Political science community thus offers the first context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theories. Also there exists cross-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2. Political science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Though its differenti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political science community did not separate from political community. Through political issues, discourses, and theories, political community became the second indispensable context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theories.

3.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s a major scheme for evaluating and reestablishing political science community. The author offers two tactics for this project:

- a. As a required course 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b. As a writing strategy of disciplinary history.

The basic intention of this essay was to build the method and defense the necessity of self-reflection of practitioner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communities and prevent from narrow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ro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by the parochialism of the practitioners themselves.